

研究生教育导学关系中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与 培育路径

——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付恒阳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12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2日

摘 要

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导学关系异化引发的价值共识断裂，成为制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探究研究生导学关系中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断裂成因与培育路径。研究发现，导学关系本质是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价值共识依托共同学术目标、相似学术理念与良性沟通互动，通过语言沟通的理解认同、遵循规范的交往实践、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三重机制生成。当前共识断裂根源在于交往行为工具化、交往理性四重有效性缺失、生活世界被经济与权力殖民化。本文据此提出重建交往理性、优化交往行为、重构生活世界的培育路径，为化解导学矛盾、构建和谐导学共同体、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

导学关系，价值共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Value Consensus in the Mentorship Relationship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ased o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Hengyang F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Received: September 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The breakdown of value consensus caused by the alienation of mento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China's 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constrain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training. Drawing o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logic of value consensus formation, its causes of rupture, and pathways for cultivation within mentor-student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ssence of such relationships lies in r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academic pursuits, with value consensus emerging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via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dherence to norms in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lifeworld—supported by shared academic goals, similar scholarly values, and healthy interactive exchanges. The root causes of current consensus breakdown lie in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communicative actions, the loss of the four validity claims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b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wer dynamic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for rebuilding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optimizing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lifeworld, offer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resolving mentor-student conflicts, fostering harmonious mentor-student communities,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Mentorship Relationship, Value Consensus,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导学关系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纽带，深刻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伴随学科交叉与科研范式变革，导学矛盾逐步凸显：部分研究生沦为项目“学术劳工”，重复劳动却难以获得学术成长；一些师生仅维持任务交付的工具性关系，导师忽视学生心理与发展困惑，学术失范事件持续冲击研究生教育生态。当前高校不断完善导师管理、师德考核等制度，但导学冲突并未得到根本缓解，根源在于导学主体间价值共识断裂，师生对学术使命、指导责任与职业追求缺少共同认知，外部制度仅能治标。价值共识断裂本质是导学交往行为异化，交往沦为资源博弈而非意义理解。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四重有效性要求与生活世界概念，为剖析导学共识的生成与瓦解提供理论工具。本文依托该理论，探究导学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径，为化解导学矛盾、构建导学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

2. 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聚焦导学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与制度约束。早期研究将导学关系划分为“指导型”“合作型”“放任型”等模式，揭示权力距离与角色期待对关系质量的影响。随着导学关系不断畸变，一些学者针对利益相关者展开策略研究，强调导师需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对学生的个体特征展开分析，进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指导与管理。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不少学者认为导学关系的和谐有序需依赖外部约束机制，例如通过制定导师调整和问责等刚性制度，明确双方权责边界，以此规范行为、化解冲突[1]。

但这类研究过度聚焦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却忽视了价值共识生成的主体间性——即师生作为互动主体，其在学术传承、成长支持中形成的信任默契与价值共鸣，同样是维系关系的核心纽带。

国内研究呈现鲜明的问题导向。一些学者研究揭示了“放养式指导”等关系困境，并提出师德考核、学术规范教育等对策[2][3]。部分学者从道德情感角度，提出推动构建“学术与价值共同体”[4]和“德育共同体”[5]。也有学者借鉴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剖析了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内在特质[6]。然而，现有研究过于偏重制度性外部干预，忽视价值共识生成的动态过程，也未能全面探讨导学关系中价值共识的系统性解构。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点考察导学关系中价值共识如何动态生成，试图理清这一过程背后的主体间性规律。在此基础上，为构建和谐和的导学共同体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进而推动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概述

3.1. 概念及内涵阐释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旨在阐释人际间如何通过沟通互动达成理解、形成公共共识。语言是交往的核心媒介，有效沟通需要满足四项条件：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7]。这类主体间交往根植于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与个体人格共同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理性引导人们跳出功利算计的工具思维，以双向理解为目标开展对话，进而凝聚共识，为构建良性社会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交往行为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不同主体依托符号系统开展的互动，语言居于首要位置。它与工具性行为存在本质差异：工具行为重在控制客体、追逐功利目标，交往行为则以相互理解为根本旨趣。交往双方通过言语对话交换观点、澄清意义，形成相互认同的共识，以此维系社会互动秩序，彰显社会行动的主体间性。

交往理性是保障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规范基础，集中体现为言语的四项有效性预设。任何严肃的言语表达，都内含四项要求：话语表意清晰，具备可理解性；陈述内容符合客观事实，具备真实性；交往活动契合社会价值规范，具备正当性；言说者坦诚表达内心想法，不刻意伪装，具备真诚性。交往各方认同并遵守这四项要求，才能维持理性沟通，搭建起平等对等的主体间交往关系。

生活世界则是交往行为发生的背景场域，是一套潜移默化的共享意义框架，包含文化、社会、个体三个维度。文化维度提供共享知识与符号资源，保障交往得以理解；社会维度依靠规范制度界定主体权责；个体维度塑造人格，赋予人参与交往的能力。三者共同构成交往默认的共识基础，当交往产生冲突时，生活世界又可以作为意义资源，修复破裂的共识。

3.2. 在导学关系中的适用性分析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具有较好适用性。导学关系本质是导师与研究生以学术传承、科研协作、人格培育为核心的主体间互动，与理论聚焦的“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导向”高度契合。导学中的学术对话、科研指导、生涯规划均需通过语言达成知识传递、规范认同与目标共识，其逻辑与“摆脱工具性目的、追求主体间理解”一致。同时，导学关系的“生活世界”维度清晰：学术共同体知识体系构成文化层，高校培养制度与师门规范形成社会层，导师学术资历与研究生学术素养构成个体层，三者共同提供分析坐标系。

但将其直接应用于中国语境仍面临挑战。首先，哈贝马斯“理想言说情境”预设对称的沟通权力与机会，而中国导学关系内嵌于高度制度化学术层级，导师掌握学位授予、论文发表、项目参与、奖学金评定乃至就业推荐等关键资源分配权。结构性权力不对等使理想言说情境无法完全实现：研究生即便有

学术分歧,也可能因畏惧被延期、被边缘化而沉默或附和;导师也可能将学术权威延伸至交往场域,使对话丧失平等性。其次,交往理性依赖语言透明性与主体间真诚性,但在“师门身份秩序”传统关系中,导学互动常裹挟面子、人情、恩威并施等非理性因素,双方可能为维护关系和谐而回避真实意图,使真实性与真诚性被策略性悬置。

面对挑战,本研究不否定理论批判价值,而尝试在承认权力不对等与非理想沟通前提下,考察交往理性如何在“有限理性”与“非对称权力”夹缝中部分实现。具体关注:权力不对等是否必然导致交往行为彻底工具化?是否存在制度安排或互动策略(如匿名申诉、第三方协调、师门民主议事)能局部修复交往理性?师生是否可能在特定议题上达成暂时的、有条件的共识?通过探讨非理想情境中的交往理性边界,避免生硬套用,在批判性吸收基础上提出更具情境敏感性的分析框架与培育路径。

3.3. 中国情境下交往理性的适用边界

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置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场景,须正视人情、面子与制度环境对交往理性的调节、扭曲乃至替代。学生常先判断是否驳导师面子、是否欠人情、是否懂规矩,而非追问导师话语是否真实正当。交往理性四重有效性并非自然生效,而被人情、面子与权力敬畏中介。

人情逻辑强调互惠回报。适度师门互助有助共同体,但过度嵌入资源分配,会使交往从理解导向滑向交换导向,正当性判断私人化,学生不敢质疑,真诚平等空间被压缩。面子机制使人维护权威、避免冲突,表达委婉模糊,可理解性与真诚性受损,关系力量替代更好论据。制度环境以项目、论文、经费、影响因子为核心,导师受非升即走与结题压力,研究生受发表、就业压力,导学交往畸变。

由此,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导学关系中的适用边界有三:理想言说情境只是批判标尺,不是现实起点;四项有效性需靠制度人工维持,不能只依赖个体道德;权力严重不对等时,共识不是完全对称的理性同意,而是第三方监督、程序保障与局部议题上的可修正共识。故培育路径不应幻想取消权力差异,而应为权力设边界、保护弱者真诚表达、为生活世界重建创造制度飞地。

4. 导学关系价值共识的内涵与生成逻辑

4.1. 导学关系的本质特征

4.1.1. 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

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是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核心本质[8]。这种关系始终围绕学术活动展开,从课题选择、文献研读、实验设计到论文撰写、学术辩论,学术探索构成了师生互动的主线。其理性特质体现在交往过程对知识真实性、逻辑严谨性和学术规范的共同遵循上:导师以专业素养引导研究生掌握学术方法、理解学科范式,研究生则通过批判性思考与学术质疑回应导师,双方在基于证据和逻辑的理性对话中推动学术认知的深化,这种交往既区别于日常情感交流,也不同于单纯的指令服从,而是以学术真理追求为导向的主体间理性协作。

4.1.2. 多重角色与关系交织

研究生导学关系蕴含着多重角色与关系的交织[9]。在知识传递维度,导师是学术知识的传授者与研究方法的示范者,研究生则是知识的接收者与学术能力的习得者;在道德教化维度,导师通过学术伦理引导、科研诚信示范,承担着学术道德培育者的角色,师生关系中渗透着价值观的传递与塑造;在情感交流维度,面对科研挫折、学业压力时,导师往往成为研究生的心理支持者,研究生也会向导师倾诉学术困惑与成长焦虑,形成兼具专业性与情感性的互动关系。这些角色与关系相互叠加,使导学关系超越了单一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范畴,呈现出学术指导者、人生引路者与情感支持者等多重身份交融的复杂

形态。

4.2. 价值共识生成的要素分析

4.2.1. 共同的学术目标

科研活动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知识创新是导学互动的核心主线。导学双方拥有高度一致的学术目标：探求学术真理、产出创新成果，承担学科传承与领域拓展的使命。师生依托严谨的研究设计、实证检验或理论思辨，挖掘事物内在规律，产出原创性学术成果；在联合攻关课题的过程中优化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边界，助力学科建设发展。共通的学术理想是导学价值共识的根基，促使师生在学术规范、科研伦理、学术价值上达成内在默契，减少个体诉求冲突。导师依托自身科研积淀引路，研究生发挥创新探索活力，形成协同治学的合力，既是稳定导学关系的内在纽带，也持续深化师生学术交往。

4.2.2. 相似的学术理念

相近的学术理念是师生形成学术共识的重要条件。学术理念涵盖对学术价值的判断、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选择，以及对学术规范和科研底线的坚守。当师生学术理念相近时，在选题研判、研究路径选择、成果评价等关键事项上更容易达成认知契合。理念层面的一致性能够减少学术沟通中的观念壁垒，推动双方在研究目标、实施过程与成果预期上相互理解，从思想层面为构建高效稳定的导学关系筑牢共识基础。

4.2.3. 良好的沟通互动

顺畅有效的沟通是导学价值共识形成的重要前提。师生在知识背景、认知视角、人生阅历上天然存在差异，即便学术目标与理念相近，也容易因信息不对称、表达偏差产生误解。有效的导学沟通要求表述清晰、立足事实，秉持平等尊重、真诚坦率的交往原则。学术研究本身复杂，师生均无法独占绝对真理，持续沟通为换位思考、修正固有认知、融合多元学术视角提供空间。良性沟通能够规避导师权威压制学生，或是师生观念持续对立两类困境，让价值共识建立在平等表达、理性协商之上，这种共识更加稳固，也是维系长期学术协作的精神纽带。

5. 研究设计与访谈发现

5.1. 研究设计

为揭示价值共识断裂的表现与机理，本研究在理论演绎外引入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经验材料检验并修正理论解释。

样本选取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最大差异抽样，选取 10 所高校 50 名研究生。标准包括：涵盖硕士与博士；涵盖理工科、人文社科及医学；兼顾 985、211 与地方高校；有至少一学年导师指导经历；尽量纳入不同性别、年级及导学关系评价者。

访谈涵盖五个维度：导学互动基本情况；学术目标与理念；沟通体验与有效性感受；权力与规范感受；职业规划与制度环境。以开放式问题为主，如请回忆一次感到被理解或不被理解的经历、与导师意见不一致时通常会发生什么，并追问具体事件、感受与应对策略。

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借鉴扎根理论的开放编码与持续比较。步骤为：反复阅读文本；开放编码；归类初始主题，如任务派发、沉默顺从、面子顾虑、职业伪装、指标压力；审查主题张力并与理论对话；定义最终主题，归纳出工具型与被动型、理想主义与功利型、放养型与焦虑型、权威控制型与恐惧型四类困境；撰写分析文本，以直接引语呈现经验证据，再作理论解释。为提升可信度，进行双人编码、成员核查、同行审议与负例分析。

5.2. 基于深度访谈的导学交往困境类型分析

5.2.1. 类型一：“工具型导师”与“被动型学生”——交往行为彻底工具化

受访者：某 985 高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化名：小张

“我导师手里有两个国家级项目，每年要发至少 4 篇 SCI。从我进组第一天起，他就明确告诉我：‘你的任务就是把实验做好，数据给我，论文我来写，你挂第二作者。’实验方案他定，我只需要机械操作。我提出的任何新想法，他都用‘没时间验证’‘风险太大’挡回来。我其实特别想做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但每次表达，导师就说：‘你能毕业就行，想那么多干嘛？’我现在已经麻木了，只要能按时毕业，当个技术工人也无所谓。”

这一案例典型地呈现了交往行为的彻底工具化。导师将研究生完全视为完成科研指标的“学术劳力”，交往不再以相互理解为旨趣，而是单向的任务派发与结果回收。从交往理性的四重有效性来看：可理解性缺失。并非表达不清，而是导师拒绝提供研究设计的完整逻辑与学术写作的训练机会，使小张始终无法理解“好的研究”究竟如何产生。真实性被悬置。实验数据虽然真实，但研究问题的提出、假设的建构等核心学术环节被导师垄断，小张的“参与”沦为对真实科研过程的遮蔽。正当性严重受损。导师以项目压力为名，剥夺了研究生作为学术主体应有的质疑权、建议权与成长权，违背了导学关系中“共同探究”的基本规范。真诚性彻底消失。师生双方在“指标-产出”的闭环中相互消耗，价值共识自然无从生成。

5.2.2. 类型二：“理想主义导师”与“功利型学生”——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价值冲突

受访者：某 211 高校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化名：小李

“我导师特别有情怀，常说‘做学问要对得起社会，不要为了发文而发文’。他推荐的书单都是经典理论，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做田野。可我不打算读博，只想毕业后考公务员或进国企。我需要的是实习经历、行测刷题，而不是花三个月去农村做深度访谈。我跟导师提过两次，他很不高兴，说‘研究生不搞研究算什么’。现在我只好两头瞒——在他面前假装热爱学术，实际上偷偷去实习。他还在组会上夸我‘钻研精神好’，我听着特别愧疚，但也没办法。”

这一困境并非源于导师的恶意或学生的懒惰，而是生活世界的意义框架与系统(就业市场)的功利逻辑之间发生了剧烈冲突。导师坚守“学术求真、服务社会”的学术生活世界价值观，学生则被外部职业系统的“高薪、稳定、效率”逻辑所驱动。双方都未完全放弃真诚性，却因意义的不可通约而陷入僵局。从交往理性看：

可理解性看似具备。导师清楚表达了学术理念，学生也理解了导师的期待。但问题在于，双方对“研究生教育的目的”这一根本性议题从未展开真正对话——导师默认“应该培养学术人”，学生默认“我想要个文凭找工作”。

正当性出现分裂。导师认为自己的要求是“负责任”的体现，学生则认为导师“不切实际”“剥夺了我的职业准备时间”。双方对“什么是正当的导学交往规范”缺乏共识。

真诚性被迫伪装。小李为了避免冲突，选择隐瞒真实职业规划，在导师面前扮演“热爱学术”的角色。这种伪装并非出于欺骗的恶意，而是在权力不对等(导师掌握评奖、实习推荐、毕业审核等)下，学生选择的“策略性适应”。

此案例揭示了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一个深层命题，即使交往双方均具有一定理性与善意，若生活世界的共享意义框架已被系统逻辑侵蚀或分化，价值共识依然难以达成。导师的理想主义看似崇高，却忽视了学生所处制度环境的真实压力；学生的功利选择看似短视，却是对就业市场的理性回应。要修复共识，需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多元职业取向的导学“生活世界”——在其中，学术训练与职业发展不再被对立，

而是被理解为研究生成长的不同维度。

5.2.3. 其他典型类型简析

除了上述两种类型之外,访谈中发现,导学关系还存在以下类型:

“放养型导师”与“焦虑型学生”:导师以“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为名,实际上长期缺席指导,研究生在选题、方法、写作全过程中得不到必要反馈。交往理性中的“可理解性”完全悬空,学生将导师的沉默解读为“不关心”或“对我失望”,焦虑与自我怀疑不断累积。其深层原因往往是导师受制于科研考核压力,无力投入时间,同时用“放养式”话语掩盖责任逃避。

“权威控制型导师”与“恐惧型学生”:导师不仅掌握学术资源,还通过公开批评、威胁延期毕业等方式建立个人权威。学生不敢表达任何不同意见,组会成为单向指令发布会。交往理性的四重有效性全面崩溃,生活世界被权力逻辑彻底殖民。

上述类型分析印证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诊断导学困境时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凸显了其理论假设(对称沟通权力、言说者真诚性等)在现实中的脆弱性。四种类型中,“工具型”“控制型”近乎完全背离交往理性;“放养型”则是交往行为的“缺席”;而“理想主义-功利型”则展示了即使双方均有善意,价值共识仍因生活世界意义框架的分裂而难以生成。这提醒我们,培育导学价值共识,不能仅寄望于导师或学生的个体道德提升,更需从制度设计、文化建设和权力制衡层面系统重构导学交往的“生活世界”。

5.3. 访谈结果的深层分析

访谈发现并非孤立故事,而是三大理论成因的经验证据。“工具型导师”与“被动型学生”对应交往行为工具化与四重有效性缺失,小张“你的任务就是把实验做好,数据给我,论文我来写”与“我现在已经麻木了”两句话,前者显示导师以产出为中心、将学生排除于研究问题与写作之外,后者揭示工具化交往对主体性的消解,背后是经济逻辑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理想主义导师”与“功利型学生”对应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价值冲突,小李既说导师“做学问要对得起社会”,又说自己“需要实习经历、行测刷题”,最终“只好两头瞒”“假装热爱学术”,而导师“还在组会上夸我”,生动呈现真诚性伪装与正当性分裂,说明双方均有善意却因意义框架撕裂而无法达成共识。“放养型”导师“缺席”使可理解性悬空,学生将沉默解读为否定,表明交往行为一旦缺失,共识便失去语言基础;“权威控制型”导师以公开批评、延期威胁建立权威,说明权力逻辑可全面替代交往理性。但四类困境不可机械还原为三大成因:困境可能相互转化,工具型在项目压力缓解后可能转为放养型;人情与面子会同时调节多种困境,学生可能因“导师以前帮过我”而忍受工具化安排,也可能因“怕驳面子”而不揭穿理想主义导师的不切实际;权力不对等还使受访者可能淡化冲突、美化导师。因此,后文以三大理论成因作为解释框架,同时保留中国文化和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使理论解释更具开放性与情境敏感性。

6. 导学双方价值共识断裂成因分析

6.1. 交往理性四重有效性缺失

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核心媒介,价值共识始于师生通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交往理性要求言语行为满足四项有效性主张: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当前导学关系中,四项主张均不同程度被悬置或扭曲。

可理解性缺失。部分导师指导意见语焉不详,如“这个不行,你再想想”“写得不好,但说不出哪里不好”,研究生长期处于理解困境,无法把握真实期望与改进方向。也有研究生因术语误用、逻辑混乱,使导师无法理解其研究意图。语言沦为“各自独白”,而非“双向理解”。

真实性悬置。在“不发表就出局”压力下，部分研究生或导师选择性报告数据、夸大研究价值、隐瞒研究缺陷。当双方发现陈述与事实不符，信任基础瓦解，价值共识无从生成。

正当性受损。导师以“为学生好”为名，要求研究生从事大量与学术成长无关的低水平重复劳动；或以毕业、推荐信为要挟，迫使服从不合理要求。语言行为背离“师生共同探究”的正当规范，沦为单向权力宣示。

真诚性伪装。研究生因畏惧导师评奖、毕业审核等权力，在组会、个别交流中刻意迎合，隐瞒真实学术困惑或职业规划。导师也可能因维护权威而回避自身知识盲区。双方戴面具交往，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策略性的合意。

当语言从“达成理解的媒介”蜕变为“掩饰真实意图、施加权力的工具”，价值共识失去第一重根基。

6.2. 交往行为工具化

价值共识需要落实为稳定的交往行为。规范本应将随机互动转化为有序的交往实践，使共识从理念认同落地为行动协调。但当前导学关系中的共识断裂，在行为层面集中体现为交往行为工具化。

导师的工具化取向：将研究生视为完成科研项目的“学术劳工”，关注产出效率而非学术成长与价值内化。指导被简化为任务派发与结果验收，真正的学术对话、方法点拨、伦理熏陶被压缩甚至取消。

研究生的工具化回应：面对工具化导师，研究生采取策略性适应——以最小代价满足任务要求，将剩余精力投入求职、考证等事务。师生在“派活-交差”闭环中相互消耗，缺乏深层价值交流。

当规范被悬置或滥用，行为目标从“遵循规范以达理解”变为“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价值共识失去第二重行为支撑。

6.3. 生活世界的系统侵入

语言沟通与规范交往最终需在生活世界中获得意义根基。生活世界由文化传统、社会秩序与人格结构构成，为导学关系提供“不言自明”的意义框架：为什么追求学术真理？为什么学术诚信不可逾越？为什么导师要关心学生发展？这些答案沉淀在生活世界的默会共识中。

当前最深层断裂源于生活世界遭到“系统”侵入。经济逻辑的渗透：科研评价以论文数量、项目经费、影响因子为核心，将“好的研究”窄化为“可量化的产出”。师生被迫投入“指标竞赛”，学术探索的好奇心、批判性、责任感被边缘化。当讨论最多的是“投几分期刊”“还差几篇毕业”，而非“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是什么”，生活世界的意义根基已被侵蚀。

权力逻辑的裹挟：导师掌握选题批准、经费支持、论文发表、毕业审核、就业推荐等关键资源。当结构性权力被滥用，交往不再是平等意义交换，而成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研究生不敢表达真实观点，导师也可能将学术权威延伸至生活领域。此时，生活世界已被权力逻辑深度渗透。

当经济指标与行政命令取代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与人格互动，成为导学交往的唯一坐标系，价值共识便失去最深层意义家园。师生即使在语言和行为层面暂时达成一致，也只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上的建筑。

7. 导学双方价值共识的培育路径

7.1. 重建交往理性：让对话从“策略表达”回归“理解旨趣”

针对交往理性四重有效性缺失的现实，需从制度层面为师生提供“说清、求真、守正、坦诚”的结构性保障。

第一，以“双向澄清制度”破解可理解性缺失。导师的语焉不详往往源于培养目标模糊或责任逃避。

为此,可在入学初要求师生共同填写《导学共识契约》,明确本阶段的学术训练目标、指导方式、论文进度期待等核心事项,并由院系备案。每学期安排一次由第三方(如辅导员)主持的“期望校准对话”,不评判、不追责,仅用于澄清未尽之处,将模糊期待转化为可操作的共同认知。

第二,以“真实性保护机制”应对制度压力下的造假冲动。学术造假并非全为个人品德问题,“不发表就出局”的环境使学生将策略性生存置于真实性之上。可试点“预注册”制度(研究前公开假设与分析方法)和原始数据的“有限开放”核查(匿名、重在区分失误与造假)。同时,对数据异常优先组织方法学讨论而非直接处罚,降低因恐惧而选择性报告的压力。

第三,以“权力负面清单与调解通道”修复正当性受损。明确列出导师不可为事项:不得扣留符合规范的论文、不得强迫从事无学术价值的低水平劳动、不得以毕业或推荐信要挟违背学生真实职业意愿。设立由师生代表与校外专家组成的“学术关系调解委员会”,接受匿名申诉,以调解优先、后议更换导师,为正当性提供制度底线。

第四,以“无惩罚性真诚表达保护”破解真诚性伪装。研究生因畏惧权力报复而伪装合意,是权力不对等下的理性自保。可建立“双盲”师生互评系统(严格脱敏),以及由督导查阅、不公开的“学术成长反思日志”,只提炼共性建议反馈给导师群体。此举不追求绝对真诚,但为真诚表达创造了低风险空间。

7.2. 重构交往行为:从“工具性博弈”转向“理解为导向的协作”

交往行为的工具化表现为导师将学生视为学术劳力、学生以策略性伪装应对。要扭转这一局面,需在制度上强制注入“非功利交往”元素,并容纳多元职业取向。

其一,强制设立“非目的性学术对话时段”。当前导学互动几乎全部围绕进度、投稿、项目等产出性议题,理解旨趣被淹没。要求每学期至少安排两次“纯粹学术对话”(每次90分钟以上),议题仅限于学科难题、经典阅读、困惑讨论等非功利内容,不得录音、考核或转化为任务。由师生共同签字确认完成情况,不计入奖惩但纳入培养档案,以此恢复被工具性目标所遮蔽的相互理解。

其二,构建“学术-职业双轨指导”制度。针对“理想主义导师与功利型学生”的冲突——双方俱有善意却因意义框架不同而陷入伪装——可为不读博的研究生配备行业导师(校友或企业人士),与学术导师形成双指导结构,将职业准备从“偷偷摸摸”转为光明正大。同时,在导师考核中增设“多元化职业发展成效”指标(如基层就业、科技创新等),而非仅以读博率评价导师,以此消解职业选择上的交往扭曲。

7.3. 重构生活世界:建立制度隔离与自救组织

生活世界被经济逻辑(论文指标、薪资导向)与权力逻辑(导师控制)殖民化,是共识断裂的根本土壤。重构生活世界,关键在于切断系统对意义世界的侵蚀,并重建师生共享的沟通空间。

第一,建立“学术-行政”隔离带,切断经济支配链条。将研究生助学金的主体部分由院系或学校统筹发放,与导师个人课题经费脱钩,导师额外补助不超过基准线的30%且须与课题直接开销相关。同时,对导师要求研究生参与的课题劳动实行“任务公开”制度:事先说明任务内容、预期时长及学术成长价值,超出合理范围的研究生可通过匿名渠道反馈。此举旨在将隐性剥削显性化,使经济关系不再直接绑架导学交往。

第二,设立“职业伦理调解委员会”作为生活世界的自救组织。该委员会由师生代表、伦理学者、法律或心理专家组成,不隶属于院系行政系统,经费独立划拨。其职能有二:一是受理并调解因学术规范理解分歧、职业伦理冲突等引发的争议,以促成双方重新理解彼此立场为宗旨,调解记录不进入任何档案;二是每学期发布匿名问卷形成的《导学生态评估报告》,向院系提出制度改进建议。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是行政与市场夹缝中为生活世界保留一块对话性飞地。

第三,推动“学术文化去量化”行动,恢复意义的厚度。经济逻辑将“研究”简化为指标游戏,必须从文化层面重新灌注意义。可设立“负责任研究奖”“伦理反思征文”,奖励在方法透明、数据共享、伦理审查方面表现突出的师生组合;鼓励师生共同撰写“学术成长叙事”(如解决诚信困境的经历、失败实验的方法论启示),作为毕业答辩的辅助材料。这些措施将“故事”与“指标”并置,为生活世界保留意义建构的文本空间。

8. 结论

本研究以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探究了研究生导学关系中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径。研究认为,导学关系的本质是以学术为轴心的理性交往,其价值共识的生成依赖于共同的学术目标、相似的学术理念及良好的沟通互动,并通过语言沟通的理解认同、规范遵循的交往实践、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三重机制实现。同时,研究揭示了学术诚信与职业伦理领域共识断裂的根源在于交往行为不合理、交往理性缺失及生活世界殖民化。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从重建交往理性、优化交往行为、重构生活世界三个维度修复价值共识,为化解导学矛盾提供系统性策略。

基金项目

立德树人视野下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导学关系研究(SLGYJG2512)。

参考文献

- [1] 吴小凡,赵磊磊,张黎.学术型博士生师生关系的问题表征与治理路径[J].高教探索,2023(6):48-56.
- [2] 周晔,张锐,刘鑫.“共在”中的“差异”:师生视角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研究——基于甘肃省高校的调查[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6):52-62.
- [3] 梁社红,刘艳,朱婉儿,等.导学关系困扰类型分析及对策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5):50-54.
- [4] 任强,王誉澄.道德情感视角下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省思与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3):77-84.
- [5] 覃鑫渊,任少波.德育共同体:建构导学关系的新视野[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9):67-72.
- [6] 王燕华.从工具理性走向交往理性——研究生“导学关系”探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1):60-66.
- [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8] 宋成.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学关系:影响因素与对策构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3):9-14.
- [9] 赵世奎,邹齐家,吴雪姣.博士生导学关系的内涵、建构与异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1):47-54.